

中国古代算命术

古今世俗研究 1

夫禀气而生舍气而长得贵
 则贵得贱则贱天施气而成
 星有精天降地气成星之气
 在其中矣富贵贱皆在初
 禀之时不在长大之后随操
 行而至也富贵或贱或富或
 富富或累富富成巨富富至
 付贱贱至贱降降天害施有
 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
 智高量远五国水处深源高
 信守仁积固志成山岳仁慈
 敬辱不成甲乙之方性建群
 明大应雨下之臣皆海又重
 阴宜归合庚辛生于中者正
 性不移或盛或衰性情易变
 水丰稷散性昏无赖主为大
 微麻披犀印木物基地天柔
 内活事无魂火数木长小州
 而大阳无决金当透薄其又
 而有神无终又曰美安他者
 木生于春夏之时无智识者
 水生于丑未之日性质聪明
 盖有气象之象临事果决皆
 阴金气之刚五行气无体必
 丰肥四柱无情性多顽鄙乃
 叹曰文章明敏兮定须火盛
 威武刚烈兮乃是金多木盛

天干地支

五行

旺相休囚死

寄生十二宫

用神

五行和四时五方

十二生肖

六十甲子

二十四节气

年月

日時

顺次相生

隔一相克

小运

大运

流年和命宫

洪丕漠 姜玉珍

上海人民出版社

54635

古今世俗研究 1

中国古代

算命术

(增补本)

洪丕谟 姜玉珍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101号

责任编辑 高百敏
封面装帧 王建纲

中国古代算命术

(增补本)

洪丕谟 姜玉珍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兵书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317,000

1989年5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2版 1992年12月第3版

1993年5月第11次印刷 印数 640,001—740,000

ISBN 7-208-00531-1/G·79

定价 6.50元

《中国古代算命术》序

张荣明

在古人的思想观念中，人们的富贵贫贱、吉凶祸福，以及死生寿夭、穷通得失，乃至科场中举、货殖营利，无一不取决于冥冥之中非人类自身所能把握的一种力量，即命运是也。

命运的观点，在古代源远流长。由夏经商历周，至春秋时，孔子弟子子夏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可见孔门弟子是信奉命运的。孔子进一步指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宋国的桓魋有一次想谋害他，孔子声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同上）！总之，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的生死存亡、富贵贫贱完全与高悬于天的命运有关，绝非尘世碌碌众生的力量所能改变。故孔子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

墨子似乎是反对信奉命运的。墨子说：“王公大人，蕢若（意即假如）信有命而致行之，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紉矣”（《墨子·非命下》）。如果天下之人皆相信个人的成败得

失完全取决于预定的命运，那么个人自然不必勤奋努力，只须静候祸福光临罢了。这样一来，王公贵族必然会怠倦于治理政务，农夫、妇女必然会怠倦于耕种、纺织，结果就会导致“天下必乱矣”。显而易见，墨子反对信奉命运，主要是从功利主义的观点出发的。

道家老子讲“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似乎排斥了天命在人世间的干预或主宰的作用。然而庄子却说：“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人间世》）。由于是命定的，故虽然知道这事没有希望，但还是硬着头皮去做。这话显然有点宿命论的气息。

西汉时代流行谶纬神学，各种方术迷信，诸如巫蛊、择日、禁忌、符应、望气、卜相、杂祀、星占蓬勃兴起。在这种社会思潮的推波助澜之下，命运的观点更是不胫而走。董仲舒、扬雄其人，《淮南子》、《白虎通》诸书，无一不是命运观点的提倡者或信奉者。甚而至于连东汉杰出的无神论者王充，他虽然批判了卜筮、祭祀、鬼神等世俗迷信，但是对于命运的观点却深信不疑。王充说：“自王公逮庶人，圣贤及下愚，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贵贱在命，不在智愚”（《论衡·命禄》）。

古人既然信奉命运，自然就殚精竭虑地设计出种种预测命运的方法，以便能趋吉避凶，把握命运。这样，算命术也就应运而生。

中国算命术大抵滥觞于汉代，迭经魏晋南朝的推行发挥，于唐代始告确立。

唐人李虚中是算命发展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韩愈评论他是：“无所不通，最深于五行书，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值日辰

枝干，相生胜衰死相王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起其年时，百不失一二。其说汪洋奥义，关节开解，万端千绪，参错重出。”（《韩昌黎文集·李虚中墓志》）

后来，五代徐子平进一步发展了李氏算命术，使之更加周详完备。自此以后，算命术在宋元明清蓬勃发展，命理著作层出不穷，算命术士代有新人。近代东海乐吾、袁树珊诸人皆是个中佼佼者。

然而古代也有怀疑与不信奉命运的明达之士。除墨子之外，屈原曾说：“天命反侧，何罚何佑”（《楚辞·天问》）？意即命运之神颠三倒四，何尝能罚恶佑善呢？道教人物指出：“我命在我，不在天地。”认为通过掌握道教独特的气功修炼方法，完全能主宰自身的命运。至于唐代吕才、宋代费衎、清代袁枚其人皆目光如炬，洞烛其谬，纷纷援笔作文抨击算命之术，鞭辟入里，锐不可当。近代著名学者林惠祥先生著有《算命的研究和批判》一文，对于古代算命术的荒谬之处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批判。

算命术当然是一种迷信，在科学昌盛的今日，可不待言而自明。但是自从算命术诞生之后，人们对于婚姻嫁娶、工商谋富、赴考求官，乃至用兵打仗、施政方略，自帝王贵族以至于黎民百姓，无不求助于算命术而企图预测吉凶。一千多年来，此道盛行不绝，愈演愈烈。即此可见，算命术对于中华民族的观念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洪兄丕谟攻古法律，擅书法，精岐黄，多才多艺，驰誉沪上，近日与其夫人姜君玉珍合著《中国古代算命术》一书，以大纲见寄，囑为序言。自古医易相通，中医理论与命理学说皆以五行相生相克之理立说，科目虽别，其理一也。洪兄伉俪以其

中医学殖，自能深解命理学说，发其底蕴，扶其谬误。然则该书对于当前传统文化之研究，恐不为无补云。是为序。

1988年8月15日写于华东化工学院文化研究所

《中国古代算命术》再版自序

对于命运之神的酷信，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俄国安德列夫有本叫做《人的一生活》的剧本，剧中人的背后，常常站着一个象征命运的“灰色的人”，人的边上则点燃着一枝烛火，以象征生命光和热的逐渐消耗。全剧基本分有五幕，以表现一个人从摇篮阶段到走进坟墓的生命历程。这期间，命运之神始终和他紧相伴随，直到生命的终结。

非但剧本这样表现，就是在生活的现实中，自古以来，西方人算命问卜的风气，也自始至终地贯穿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之中，直到如今。

西方的命理学说与中国相比，毕竟没有中国那么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命理文化面前，西方的命理之学，显得多么苍白逊色！

几千年来，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命理之学，盘根错节、影响深广地深入于各个领域。如《史记》、《汉书》、《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等，都有对命的描述和论说。作为一种民俗文化，一种学术课题，我们对此自有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必要。可以这样说，不了解我国传统的命理文化，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我国古代的民俗，真正读懂读通我国的优秀传统学术名著。

然而问题在于，命理之学既是我国文化史、学术史上一个重要而无可回避的课题，同时在古代社会中，它又被如此地奉为神明，可是由于多年禁锢的结果，长期以来，我们的学者在这个学术问题上投鼠忌器，裹足不前。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命理文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现象，加之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它又不可避免地被掺进了众多的人为因素，其中不仅有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封建伦理道德观，而且更有不计其数算命术士主观上有意无意的掺杂，这就使得本已十分复杂的命理文化更加迷离扑朔，面目难辨，以致不可避免地被深深打上了“封建迷信”的烙印。文化和民俗的纠结，学术和迷信的错综，这就使得当今学者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探索，具有极大的艰巨性和科学要求。

发轫于汉魏之际的古代算命术，撇开江湖术士的那套欺人之谈，单从学术文化角度考察，无疑是博大精深且又自成体系的一个颇值探索的领域。作为学术文化，其术推行的理论依据，主要为阴阳五行，四时干支，属于中国古代哲学系统，或者归入术数的范畴。

我国古代哲学认为，阴阳是世间万事万物对立统一，相反而又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在时序上，春夏属阳，秋冬属阴；在昼夜上，白天属阳，黑夜属阴；在寒暖上，温热属阳，寒凉属阴；在速度上，速的属阳，迟的属阴；在事物性质上，刚的属阳，柔的属阴；在数字上，单数属阳，双数属阴。如此等等，推演下去，又有火属阳，水属阴；动属阳，静属阴；外属阳，内属阴；积极属阳，消极属阴；以致于在天文上太阳属阳，月亮属阴；生物上动物属阳，植物属阴等等。然而，阴阳的精义还在于，阴阳之中还有阴阳。以男女来说，男的属阳，女的属阴；可是男的属

阳也不是纯阳，而是阳中有阴，女的属阴也不是纯阴，而是阴中有阳。原理是：孤阳不生，独阴不长，只有阴阳相互作用，才能使万物生生不息，变化无穷。

至于五行，古代哲学认为，木、火、土、金、水五行是组成自然界最基本的五种物质基础。这五种物质有生有克，生是促进，克是抑制。相生的规律是顺次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周而复始；相克的规律是隔一相克，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然后又周而复始。生克的奥妙在于，“造化之机，不可无生，亦不可无制。无生则发育无由，无制则亢而为害”。没有生，就没有自然万物的生生不息，也没有世界；而无所抑制，世界就会发生混乱无序的状态，换句话说，即失去了生态平衡，整个自然界将会因此而乱了套。为此，关于五行学说，至少可以把它看成为是一种古人认识世界的自然观。

在五行学说中，五行又与四时干支联系，春属东方甲乙木，夏属南方丙丁火，秋属西方庚辛金，冬属北方壬癸水，四季属中央戊己土。如再联系具体月份，夏历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辰，四月建巳，五月建午，六月建未，七月建申，八月建酉，九月建戌，十月建亥，十一月建子，十二月建丑。此外，在时间上，又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分统十二时辰的学说。再之，还有地支与生肖的联系，子年生属鼠，丑年生属牛，寅年生属虎，卯年生属兔，辰年生属龙，巳年生属蛇，午年生属马，未年生属羊，申年生属猴，酉年生属鸡，戌年生属狗，亥年生属猪的十二生肖观念。

有了这些理论，再借助于天干地支纪年、纪月、纪日、纪时，命理学的文化工具就齐备了。命理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自然有其令人信服的外表魅力，即将人作为自然界中的一个存在，以时间、物质、季候的确定、变化作为依据，从而推测人生的吉凶祸福。这比起毫无根据的原始筮术来，无疑要进步得多。因此可以这样说，在一定程度上，命理学是以原始朴素的唯物自然观来探究人生奥秘的一种学术。当然，由于这种探究最终和科学实际挂不起钩，所以导致了它终于不会走向真理和成功。相反，随着无聊文人的穿凿附会，加上各路江湖术士的混水摸鱼，遂使算命术在历史的流程中，变得日益驳杂、繁琐，乃至充斥着胡编乱造，这就使得本已不足为训的算命术，愈来愈趋向于神秘化。对此，宋代费袞早在《梁溪漫志》中就提出质疑：“若生时无同者，则一时生一（种）人，一日当生十二人。以岁计之，则有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计之，止有二十五万九千二百人而已。今只以一大郡计，其户口之教尚不减数十万，况举天下之大，自王公大人以至小民，何啻亿兆，虽明于数者，有不能历算，则生时同者，必不为少矣。其间王公大人始生之时，则必有庶民同时而生者，又何贵贱贫富之不同也？”宋代庄绰《鸡肋编》卷上还结合实际说：“世之以五星历论命者多矣，今录贵而终凶者数人。方其盛时，未有能言其未至之灾也。以此知阴阳家不足深泥，唯正己守道为可恃耳。”这里，费袞从同八字者颇多不同命运的事实入手，庄绰从“方其盛时，未有能言其未至之灾也”着眼，文笔犀利，批判有力。

降至明末，郑仲夔《耳新》也说：“铅山友人李倩玉国球，与余门人玉山毛诗，年、月、日、时皆同，而李以辛酉发解，毛至癸亥始食饩于庠；李中戊辰进士，授庶吉士，寻卒于官，无子；毛多子而且令，至今犹在诸生中。又鹤湖在中上人，与浙江徐进

士在中，年、月、日、时亦皆同，又皆名在中，而一为高僧，一为名进士。此四人八字者，星家将何以推算耶？”

又如连清代命理学家陈素庵相国在《命理约言》中也认为：“尝考人命富贵贫贱，验者颇多，惟寿夭验者较少，盖一念之善，可以延年，一事之恶，足以夺算，苟恃命之生与永，而多行恶事，知命之死与促，而广积阴功，此则爱之不能使生，恶之不能使死，区区八字干支，何足道乎？”同书又批判神煞吉凶说：“即如桃花、流霞、红艳等煞，为男女淫欲之征，然端人正士，烈妇贞女，犯之者甚多……且春花无不妖艳，何独桃为淫花？干支字面相见，有何红色艳态，神煞诞妄？”“又太岁三合之墓，谓之华盖，或以为文章，或以为孤高，亦不足凭也。”有意味的是，《命理约言》在论富贵吉寿，贫贱凶夭时还颇为着力地说：“故凡欲求富贵吉寿，而免贫贱凶夭者，当以积善为要，每日自记功过，必期念念皆仁，事事皆善。久必如其所愿。若恃命之善，而敢于为恶，咎命之薄，而不思挽回，此为天下至愚之人，无志之士矣。诸命法皆末耳，是乃要法也。”而“诸命法皆末”，“积善为要”的实质，就是说明人定能够胜天，命的吉凶，可以在人的主观作用下得到较大程度的改造。

至于笔者所接触到的不验实例，袁树珊为民国以来著名文人命理学家，解放伊始，当今文界前辈徐开奎先生曾请他批过命书。命书论文笔，实属优美绝伦，其于文末，袁氏继续批道：“五十六岁申运，以退为进。寿愈六旬，妻续子双。”这里的意思是，你徐先生命中癸水如雨，未免有雨量太过，日光不强之弊，所以当中年火运济水，振刷精神，好谋进展以来，至此申运生水，助纣为虐之际，已再也无可作为了。可事实是，徐先生退休后，至今虽已年届古稀，可却仍然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并

有力作《巴金传》即将问世。再如“妻续子双”问题，开垒先生至今仍与原配的糟糠之妻白头相守，而儿子也却只一个，今在美国，又何“妻续子双”之有？又据开垒先生告我，袁树珊说他父母都只有五十几岁的寿数，可是最后却都双双活到了八十多岁。袁树珊先生所批尚且如此不验，其他江湖辈就更可想而知了。

再上溯战国韩非子《非命》三篇，下及袁枚《随园随笔》“大挠作甲子”“犹云一三三四也，并无意义，有何生克配合之说”的无情驳斥，都可谓切中算命术之弊，把算命术给数落得体无完肤。

至于江湖术士借算命之术在江湖上混口饭吃，那又是和学术全然无涉的另一回事了。自古以来，我国算命术就有学士派和江湖派两个大系。学士派系文人学士所为，江湖派则处于社会底层。据行家揭底，江湖派的瞎子算命，旧时会聚在上海的有宁帮、徽帮、维扬帮等多种帮派。比如维扬帮的瞎子算命，除师徒相授的一套固定套路外，另外还有“牵进拔出”的诀窍。“牵进”就是把算命对象心里希望解决的疑团一个个地牵将出来，“拔出”就是根据这些牵将出来的算命对象的疑团，再进一步把对方经历的底细巧妙地盘剥出来。经过这样一牵一拔，瞎子心里就有底了，可以凭三寸不烂之舌海阔天空地进行施展，并针对各种不同对象因人制宜地巧妙应付。

搁开以上所述，算命是种迷信，至今已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清楚认识。然而，作为一种批判性研究的学术著作，为了行文和阅读的连贯性，避免割割裂裂的琐碎批判，笔者于撰著之余，除了个别之处插进适当的批判文字外，另撰专门章节，以对其中确确实实存在着的谬误，作一总结性的鞭辟入里

的批判。当然，这种批判是建立在摆事实，讲道理基础上的，而决不是泼妇式的骂街。

《中国古代算命术》三版自序

1990年3月7日，洪丕谟于瓦雷庵窗下

《中国古代算命术》在文化史或学术史上，中国算命术都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多少年来，算命术却以天官身的巫祝又和其他特殊原因，一直被深深地打进了冷宫。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学术现象，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在我国所有学术文化中，从科学的深广来讲，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同它分庭抗礼，并驾齐驱的。这不仅表现在学术大儒身上，连平头这种神鬼预测的方术也注了莫大的兴趣，并且在广大平民百姓中，也是由来夙远，大有尽人皆知的味道。虽说这种观念的产生，有着它特殊的自然和社会原因，但是早是由于历史的巨大惯性作用和社会主义意识的长期根深蒂固，都受到了科学的冲击又有神鬼唯物主义的广泛发展今天，要把这种充满神秘色彩的算命术的某些唯心主义的成分完全抹去，恐怕也是不容易，决不可能，更何况，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学术现象，它自身也存在着向上精神和研究探讨的成份。

当然，建立在天官身上的算命术，平头术等等就不得不承认是我们的认识，对于这种神鬼预测术的破除和科学认识，我们应当有充分的认识，决不容许，尤其绝不允许，一谈到大儒或平头术，又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对于这种神鬼预测术的

《中国古代算命术》三版自序

无论在文化史或学术史上，中国算命术都该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多少年来，算命术却以其自身的推测天命和其他种种原因，一直被深深地打进了冷宫。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学术现象，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在我国所有学术文化中，从影响的深广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和它分庭抗礼，并肩起坐的。这不仅表现在学者大儒身上，多半对这种神秘预测的方术倾注了莫大的兴趣，并且在广大平民百姓中，也是往来风靡，大有尽人皆醉的味道。虽说这种现象的产生，有着它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可是由于历史的巨大惯性作用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根深蒂固，即使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高度发展的今天，要把这种充满着唯心主义神秘色彩的算命术从人民群众心目中完全抹去，显然也任务艰巨。堵不如导，更何况，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学术现象，也自有它存在的土壤和用作研究的价值。

当然，建立在天命观上的算命迷信，早晚非彻底破除不可。但是我们认为，对于这种根深蒂固迷信的破除办法，说理的导和必要的堵双管齐下，总要比生硬单一的堵来得更彻底，更有效。又因为在人的心理上，对于越是神秘而弄不清楚的

东西，越是密不透风不让他们知道的东西，他们就越是千方百计地想弄个水落石出，一清二楚。这里，我们索性揭开算命术的神秘面纱，把它从密不透风的保险柜里搬到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进行一次彻底的理性研究和批判。相信这样一来，人民群众在了解它的庐山真面目后，原来对它的神秘感就会消解，原来对它的迷信就会驱散。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因为唯物主义是科学的，而今天我们采取的，正是这种科学的态度。

也正因为基于这种认识，于是乎在80年代末期，便就有了拙撰《中国古代算命术》的出版。

在时间的流逝中，自拙撰《中国古代算命术》初版、再版以来，不断收到广大读者从各个方面雪片般飞来的信件。这些信件归纳起来，大致有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拙著与邵伟华《周易与预测学》作比较，委婉地批评鄙人，对于中国传统神秘文化，没有邵先生那份敢于全面肯定其为正确、科学的勇气。二是从个人前程吉凶出发，要求鄙人为其预测未来，但其中也不乏通情达理，深知作者工作繁忙而并不勉强的。三是有的读者提出，可把再版中删除的秤骨算命法重新补进第三版以聊备一格。四是述说此书难觅，纷纷来信要求鄙人为其代为购买。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琐碎问题。

鉴于以上情况，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对于第一点，笔者想在这里加以说明，拙撰《中国古代算命术》的性质，是一本系统梳理、探讨我国古代命理文化的学术著作。为此，本书的框架结构，非但涉及中国古代算命术的基础理论和方法，同时还从天命观的产生、先秦诸子天命观等视角，阐述算命术的缘起和发展，最后并从历史、辩证的角度，对算命术的谬误，作了实事

求是的说理性批判。所以，尽管鄙人和邵先生有着朋友之谊，但两书编写的着眼点有所不同，则是显而易见的。为了加强本书的学术性，这次增补，又在第一章里，加进《古代命理典籍概览》一节，以见我国命理文化发展的脉络。

对于所说第二点，为了坚定人们拼搏人生的信念，这次增补，并在第四章里专门添进《事在人为》一篇。由于几千年来，在孔夫子“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思想的影响下，即使时至今日，仍有好大一部分人信奉天命而趋之若鹜，尤其对于那些穷途失意，谋事不成的失败者来说，更是如此。然而问题还是在于，对于“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正确理解。所谓“谋事在人”，就是人的因素第一，在极大程度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所谓“成事在天”，这个“天”，我们大可把它看成为是社会上各种复杂因素凑在一起而造成的机遇。如果有了这种认识，那末我们谋事成功自属可喜，如果不成则亦不必灰心馁气，要紧的是获取心理上的平衡。因为古人早就说过：“有志者，事竟成。”相信只要你矢志不移，总有获得成功的一天，只不过是成功有早晚，成就有大小罢了。至于要求本人为其预测人生运程，由于本人不是预测学家，缺少实践，加上身体欠佳，工作繁忙，手头又有好多其他事情要做，所以敬请广大读者诸君，予以谅解，不要再在这方面给作者来信为感。

再如所说第三点，鉴于社会上对此书初版的盗版本时有所见，错字连篇，读者深受其害，所以这次增补，经与责编高百敏商量，并听取他的意见，决定把初版所列《无师自通的秤骨算命法》一节，作为“附录一”，并改名为《聊备一格的秤骨算命法》，或许这样可对社会上拙作初版的盗版之风，起到一定的禁遏作用。